

第一百四十一回

王明拟《八一宣言》 洛甫开瓦窑堡会

书接第六卷第一百一十六回，1935 年 5 月 29 日傍晚，红军飞渡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县城。

当夜，在泸定桥畔的一间土屋里，张闻天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进军路线。会议决定：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绕过敌军。张闻天还通报说：3 月中旬，在黔北鸭溪途中，我们会派出潘汉年前去上海了解地下党的状况，并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但至今情况不明，决定再增派陈云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了解和恢复白区党的秘密工作。

陈云，原名廖陈云，1905 年 6 月生于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章练塘。14 岁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参加‘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返乡从事农民运动。1929 年 9 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军委委员以及中共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1930 年 9 月任候补中委、中共临时中央成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 年 3 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4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负责对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组织的秘密工作。

政治局会议后，刘伯承还特地为陈云写了一封给四川省商会会长胡浚泉的介绍信，以便他路过成都时使用。

6月7日，红军攻占天全后，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严达人的陪同下，陈云来到天全县北、夹金山下的灵关村小学。该校校长席懋昭是中共党员，他受派护送陈云出川。

他们从灵关村直攀山路，避开白军，绕至荥经，过雅安、走成都，在胡浚泉的亲自掩护下，安抵重庆。在朝天门码头，席懋昭送陈云登上东下的轮船。途中，陈云不慎失落了所携的联络密码，到达上海后一时未能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幸亏这时潘汉年也辗转从香港抵达上海。

原来潘汉年接受返回上海的任务后，化装成烟土贩子，跟随烟贩跋山涉水、闯关过隘，历经黔、桂、粤，至广州，转香港，来到上海。他与陈云相见后，便一同与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这时，他们才陆续得知：中共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所增设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自第一任书记李竹声叛变以来，已经先后遭到了六次大破坏，中共河北省委也遭到七次破坏。1934年9月，由于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信联系被迫中断。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属机关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7月后，上海局不复存在。至此，白区党的组织绝大多数均遭破坏。

继而陈云得到宋庆龄的协助，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安排下，8月5日和陈潭秋、杨之华、曾山、何实础（何叔衡之女）等秘密登上苏联轮船，到海参崴后换乘火车，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即8月20日抵达了莫斯科。随后，潘汉年也经西欧前往苏联。

7月25日开幕的共产国际“七大”，是共产国际转变其世界革命战略的重要大会。中国共产党参与‘七大’筹备工作的是吴玉章。

吴玉章，原名吴和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1903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时年27岁。从此投身革命，曾回国营救过被捕的谋刺清王朝摄政王的汪精卫，并与黄兴策划过广州起义。1911年7月参与组织的荣县反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1917年自法国归来，代表四川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军政府。1925年2月，在北京经其学生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代表四川国民党组织筹备并参加国民党二大，任大会秘书长，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会议委员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中央党部秘书，参加了大革命和北伐，出任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赴苏联中山大学研究院和特别班学习。此时他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等职。

因为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工作，吴玉章在这年6月就已知道共产国际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准备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革命新战略。这一政治战略的转变动向，引起了吴玉章的深思。他联系到1935年5月以来国内的华北事变等民族危机的严重态势，便随即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磋商。他们取得共识后，联名急电代表团团长王明。

此时，王明正在苏联的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所休假。他得电召，迅速赶回莫斯科议事。他在认真听取了吴玉章等人的意见后，依据共产国际新的战略方针和国内的民族危机，用四天时间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经代表团会议讨论、修改形成初稿，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共产国际即将实行的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战略。

本来，德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除苏联共产党（布）之

外，两个最大和最有力的党，分别代表着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可此时，德共已遭到希特勒法西斯的严重破坏，因而，拥有苏区和红军的中国共产党就更显得重要了。

8月1日，德共领袖威廉·皮克在向‘七大’全体会议的发言中，盛赞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说：“它的英雄斗争和伟大的胜利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自豪感和信心。”

具有国际历史意义的共产国际‘七大’，确定了在资本主义各国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任务。在“七大”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经王明译成俄文，送季米特洛夫定稿，并得到斯大林同意后，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于1935年8月1日正式印发，故通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又强调：“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即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八一宣言》还号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八一宣言》印发次日，季米特洛夫即向大会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

的任务》的主报告。在报告中，他代表共产国际明确支持《八一宣言》说：“我们的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与中国领土内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及个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提议。”

这样，共产国际“七大”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纠正了自1928年7、8月共产国际“六大”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不再将中间力量看作危险敌人，决定实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革命战略。同时鉴于1934年9月以后，共产国际就同开始长征的中共中央失去了电讯联系，而《八一宣言》又是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印发的，所以不等会议开完，共产国际主席团便和中共代表团商定：选派代表迅速返回中国传达“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

中共代表团选定张浩回国执行这个任务。

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染织工人出身。1919年秋和其兄林育南在家乡创办浚新小学和通俗讲演社，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此投身两湖工人运动。1924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回国，任上海杨树浦部委书记，参加了大革命和北伐。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候补中委。后奉派赴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的中共党团书记。次年赴莫斯科治伤，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成员，参与起草《八一宣言》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由于张浩既有威望，为国内同志所敬重，又对共产国际实行

战略转变的背景与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所以送报共产国际后，季米特洛夫当即批准张浩为共产国际代表，要他迅速回国设法找到与共产国际失去通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尽快传达贯彻国际“七大”的精神。8月10日前后，张浩离开莫斯科，取道远东，赶回中国。

再说中共代表团于8月25日至27日在莫斯科开会讨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与贯彻‘七大’精神的问题。陈云、陈潭秋等应邀与会，听取了有关‘七大’的文件传达。王明作了题为《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的报告。

在讨论中，吴玉章说：“《八一宣言》完全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新战略和我国目前的政治形势。随着群众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帝的统一战线，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准备同那些动摇不定的、不可信赖的和暂时的同路人也结成统一战线。我从报上看到当红军兵临四川省境时，国民党指挥官邓锡侯同红军签订了一项互不进攻的协定，从而使红军得以占领战略要地土门，这种独特的统一战线意义极其重大。”

接着，陈云说：“是的，统一战线意义非常重大。这次中央红军西征从开始行动，仅用25天便顺利突破了白军的前三道封锁线，也是得益于同陈济棠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然，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还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没有自觉到有如现在国际‘七大’所确定的战略性转变的高度。但这毕竟表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因此，我们应加紧实行政治策略的根本转变。”

最后，代表团还决定将体现共产国际‘七大’新战略的《八一宣言》，通过公开和秘密的、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尽快传向国内各地并昭告海外，又指定吴玉章具体执行这一任务。

吴玉章 1913 年 11 月曾赴法国巴黎法科大学留学，并旅居法国 4 年之久，还和蔡元培等人倡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所以中共代表团派他去巴黎主办报纸。吴玉章抵达巴黎后，在 10 月 1 日出版的中共代表团的中文机关报《救国报》第 10 期上首次全文刊发《八一宣言》，并撰文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随即将《八一宣言》印成小张传单，运到香港等地，并利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资助的《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册，将它广泛寄发到国内各地，同时还通过各种秘密途径，将《八一宣言》传向社会各阶层。

当时，国内各地许多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地下党组织，正是通过《八一宣言》，得知了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开始宣传与贯彻这一新策略的。《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上海地下党为促进文艺界的广泛团结，更好地为抗日救国运动服务，决定解散“左联”，并重新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作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口号。《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引发了中共北平市工委内的一场党内争论，促成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兴起，使中共领导下的白区群众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和新的格局。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中央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率领下，于 1935 年 10 月 19 日黄昏时分，抵达陕、甘交界处的保安县吴起镇。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常委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商定分为两路同时行动：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军委机关和红一军团移至甘泉南面的道左铺，会合原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共同对付白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由张闻天（洛甫）、博古等带领中央机关北赴安定县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落脚安家。

11月7日，陕甘苏区政府隆重欢迎中共中央等机关人员进驻瓦窑堡市。三天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到陕北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两个重要文献：《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明确宣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成为不可分离的两位一体的任务。”

到瓦窑堡后，张闻天同党中央秘书长刘英结成终身伴侣。他们是1929年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识的，后来在中央苏区更加熟悉了解，遵义会议后，他们又一道在长征路上共事。新婚的一天，刘英刚回家，张闻天便对她说：“‘远方，来了人！’去看看。”“远方”是当年临时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习惯性称呼。一听到这个消息，刘英立即和张闻天一同来到隔壁的窑洞里。洛甫指着一位反穿着光板羊皮袄的壮年人介绍说：“他是张浩同志。共产国际派他回国，刚才到的。”

刘英好奇地询问：“你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呢？”

张浩说：“一路上我是有车坐车，没车走路。”原来，他1935年8月初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了远东，从蒙古越境后，又自己赶着一匹骆驼，扮成商人，穿越了“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戈壁滩大沙漠地带。后来又改装成小贩，挑着货郎担，沿途打探，东寻西找，这前后历尽艰辛、辗转周折，整整走了3个月，终因在途中见到了陕北红军的布告，最后找到目标——定边县。到了定边县境，又由定边县地方赤卫队员武装护送到瓦窑堡。

刘英又问：“你怎么知道中央到了陕北呢？”

张浩说：“开国际‘七大’时，吴（玉章）老的报告中援引有红

军在四川与白军打仗的消息；去年，阎红彦（当时在河北省军委工作）根据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决定赴莫斯科汇报学习后，我们就知道了陕甘晋边有谢子长、刘志丹两支红军在活动。”

张浩顾不得长途跋涉的劳累，就同张闻天夫妇谈开了。接着，他又会见了中央的博古、刘少奇、李维汉、邓发等人。

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到达瓦窑堡，会见了张浩，听取了他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内容的口头传达。

经过一系列准备，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安定县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会址就是张闻天刘英居住的那孔小石窑。张闻天夫妇只在炕前支了一张旧方桌和几条长凳，便成了会议室。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郭洪涛、李维汉、张浩、吴亮平等12人出席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第一项议程是关于政治形势与策略，张闻天先作报告，毛泽东作补充发言。

随后张浩在会上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季米特洛夫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报告以及《八一宣言》等主要文献的基本内容。会议就此展开讨论。

开始时，博古、凯丰等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两种可能性都还是持有怀疑。他们还引经据典，反复强调应当贯彻阶级路线，“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仍十分明显。

毛泽东批评了博古等‘左’的教条主义倾向。历经千辛万苦和万水千山的中共领导人，经过充分而认真的讨论，很快就取得了共识，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沿用适合于国情的名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族阵线’，摒弃了过去坚持的‘下层统一战线’那种关门主义的‘左’的倾向。

瓦窑堡会议在 23 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 月，扩大红军 5000 人，赤化宜川和洛川，完成渡河准备；2 月，过黄河东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辟为初期根据地，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然后相机北出绥远，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即通称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正式确定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在反革命营垒中存在着新的动摇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性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同时还确认：当前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党必须发动、团结全国各民族中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明确提出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主张。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张学良应召归国 毛泽东即兴赋诗

话分两头。单说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于 1933 年 3 月 9 日，在石家庄车站向蒋介石表示了愿意引咎下野的打算后，又同宋子文伫立车站，目送蒋介石专列出站南下。宋子文见张学良凝望着铁轨发呆，心中油然升起了对张学良的同情，并颇感歉疚。于是，他不去自己的专列，上了张氏座车。

二人一路长谈，车到长辛店站时，已是夜里 10 时半了。宋子文这才告辞回到自己的专车。行前，还特地连声提醒道：“汉卿，一两天内，我们上海再见啊！”随后，宋子文返归石家庄，向蒋交差去了。

俟宋子文南去后，张学良即离长辛店，直抵北平。

回到顺城王府，王卓然问：“委座要副司令马上飞赴上海，但不知需要我先做些什么准备？”

张学良却叹息说：“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我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一天啊！我仿佛记得林肯总统有言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请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给我。”

王卓然欣然应承，回屋即动手翻阅图书，查到原文后立即译成中文抄好：

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
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

但却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当王卓然将这则抄写好的中英对照语录送交张学良时，已是次日凌晨 2 时。张学良尚未休息，还在灯下忙着。

上午，张学良在顺城王府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他介绍了与蒋介石在石家庄相会的情形，叙述了自己辞职的经过，随后宣布：“我已与委座商定了军事善后问题，现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以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各军军长之职。希望诸位协助四位军长带好东北军队。特别是训练东北军人知耻自强，要他们懂得天天流汗、时时准备流血的重要。只有这样，方可达到复土还乡的目的。”

张学良 3 月 11 日通电下野，声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我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但我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

接着，张学良与身边的幕僚们秘密地商议了待机“再起东山与还乡”的大计。谋士们一致主张：“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则要发展东北大学（已迁到北平）。’张学良决定由王卓然以东北大学秘书长的身份，代行东北大学校长职权。他还专门召集东北大学的领导人员，叮嘱说：“十年前，为开办东北大学，实在费了许多心血。我个人迄今先后的捐款已近 200 万元。当初之意，着重在培养实用人才，以期建设新东北，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

张学良稍稍停了停，又道：“如今东北沦亡了，华北也危急了。但是东北大学一定要保存下去，要用东北大学维系东北人心，借此睹物伤情，痛鉴覆车，愈知效忠于国家。

“现在东大师生来北平复学，今后的训练要在‘明耻自强’上

注意，即不徒怨日本人太凶横，更要怨恨自家人太不长进，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所以就是要他们天天流汗，时时准备流血，这样方可达到复土还乡的目的。”

王卓然听后回答说：“副司令，我们一定记住：东北大学是东北的生命线，在国家，可借此维系东北人心；在东北人民，可借此以知道国家不忘东北；在国内同胞，可借此睹物伤情，痛鉴覆车，愈知效忠于国家。我们一定认真办好东北大学，认真训练学生，担负历史责任，以救国还乡为宏愿，一心一德，共同奋斗。”

张学良听后，点头道：“对，就要有这个观念。并且，你们还要使学生们懂得：如有丝毫造就私党之心，以遂个人争权夺利之欲，必遭天诛地灭，永世不配作人！”提过不表。

再说蒋介石担心张学良中途变卦，在 3 月 12 日，即由国民政府正式下文：“准免张学良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行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

训令已颁发，显然是迫张迅即离职。张学良只得在当日乘机飞离北平，赴上海私邸落脚。

何应钦前脚去机场送走张学良，回身便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他在会上宣读蒋介石致东北军将士电文，内中说：“张代委员长所爱护之将士，皆中正之将士，爱护之责，决无二致。”接着，何应钦宣布北平军分会机关：“一切照旧，望各安心。通力合作，以御日寇。”按下何应钦部署长城御敌军事不表。

再说张学良飞抵上海后，即在法租界高乃依路 1 号下榻。宋子文特地给他请到了美国医生米勒为他戒鸦片，并要求张闭门治疗。为了根治此顽癖，张命令左右：“无论我忌针后怎样痛苦呼喊，你们也不准给我再打针了。谁要胆敢走近我的床头，我就一

枪把他毙了。’随后,他又对赵媿说:“小妹,现在我把手枪交给你,千万不许放任何人进屋。他们谁不听话,你就给我毙了!”未及半月,他就戒掉了鸦片烟。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携妻于凤至,女闾瑛,儿闾珣、闾玗、闾路,私人秘书赵媿、顾问端纳与爱尔德以及护士、随员和侍从,一行18人,乘坐意大利邮轮“罗西伯爵号”离开上海,经香港转赴西欧游历。

5月12日,张抵意大利,受到意大利外相加·齐亚诺和夫人爱达的热烈欢迎。加·齐亚诺伯爵是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女婿,他曾先后任驻沪总领事、驻华公使,与张学良私交甚笃,因而款待十分殷勤。此后,张学良以意大利为落脚点,遍访英、法、丹麦等西、北欧诸国,但留驻时间最长的仍是意大利。他虽然很欣赏英国的立宪民主制,但却醉心于德、意的法西斯专制政体。也多次表示:“我国民众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

在张学良赴欧考察后,国内事变频仍:5月至6月新疆发生动乱,11至12月,福建又发生十九路军组织的反蒋抗日事变。蒋介石为此两次打算动用东北军平乱,均遭东北军将领婉言拒绝。蒋介石被迫在年底电召张学良返国,打算动用东北军南下“剿共”。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一行在王卓然等亲信的陪同下,由香港抵达上海,吴铁城等上海党政要员均前往码头迎接。登岸后,张学良发表书面谈话说:此次受命考察西欧政务、军情,颇多心得。欧战的败国意、德之所以复兴,是因为他们能够万众一心,拥护领袖。所以领袖有力量,能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我国内战连年,外患乘之;要是国民不甘心作亡国奴,非大彻大悟,

信仰并拥护领袖不可。”

这时，张学良身体健壮，精神焕发。蒋介石接见他时问道：“汉卿，回国后有什么打算？”张学良的回答使蒋介石吃惊：“大哥，我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对于这个愚弟，蒋介石早有安排，立即说：“不，你还是继续带兵吧。东北沦陷后，国人对你多有不满和不谅解。你应当做几件事来扭转你的形象。”

张学良答道：“那么，请给我最难的任务。”

“我看剿共最为困难！”蒋介石高兴地介绍说。

“行，那我就干最难的事吧！”

蒋介石开完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便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3月1日，张学良宣布就职，并驻节武昌，随即陆续调东北军主力南下“剿共”，将王以哲的六十七军派驻豫南，何柱国骑兵军防守鄂东，刘多荃独立师移往平汉线南段。这样，东北军参加了第五次“剿共”内战，攻击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部。

张学良接任后十分卖力，并常到鄂东、豫南的东北军驻地巡视，向属下介绍他的旅欧见闻。一次，他去到鄂东何柱国军部，向何柱国的军部人员介绍了他对西欧政治的观感。他对英国的议会民主的评价是：“我曾去伦敦参观过英国议院的辩论会，那可真是一派绅士味道。发言十分自由，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可是言谈中却是态度和蔼、彬彬有礼，真有民主作风。”

对此，何柱国关心地问张：“副司令，你看我们中国可不可以学习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呢？”

张学良答：“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的实践，民主作风深入民间。我们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

本家，所以政党政治很难使国家政局稳定下来。我们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

何柱国又问：“中国的出路何在？”

张学良道：“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用开明的集权政治不可。而国家的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一条出路。”

“当然，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为法西斯蒂道路，一为共产主义道路。可惜，我未曾能去苏联游历考察。但就我所知，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又并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行。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那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就是模仿德、意，这样还有可能迅速复兴中国。意大利法西斯蒂首脑墨索里尼有句名言：‘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这就是法西斯蒂的集权政治的根本特色。只有当领袖出缺，而要选举新领袖时，法西斯蒂才开大会。同时，对于资本家的利润也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要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此作法，我想德国也一定会很快复兴的。”

何柱国追问道：“中国又如何学德、意以救国呢？”

张学良回答：“我回国后会劝委座摹仿这种办法。但他说也许五年以后才行。我看委座手下，（新）政学系是人才多而无政治基础，CC系是有基础而无人才。我们是军人，也只可以与黄埔系连成一气，共谋救国之道。所以，我要在东北干部中组织四维学会，以训练人才，并与黄埔系打成一片。不过，部队中的带兵军官，是不可以加入此组织的。”

正是这样的想法，促使张学良派出“复东会”——为光复东北三省而建的东北人士的爱国组织的核心人物王卓然、王化一到南昌北坛晋见蒋介石，并和蒋指定的复兴社骨干戴笠、刘健群和邓

文仪商谈组织“四维学会”，用以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协力拥护唯一领袖，肩起复兴民族之大业。

张学良这种热心鼓吹法西斯政治的劲头，正是蒋介石欲求不得的。经蒋介石亲自审定，四维学会于 5 月 12 日在汉口银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王卓然、刘健群为正、副理事长，复兴社的贺衷寒、戴笠、邓文仪、曾扩情、丁炳权、袁守谦和复东社的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等 13 人为理事。会后，全体理事又齐赴南昌晋见领袖聆训。蒋介石接见后，对他们慰勉有加，并特地将阎宝航留下，参与办理‘新生活运动’，以吴瀚涛担任海会寺训练团教官，以表示对东北军的同情之意。由此，张学良成为国内第一个积极支持蒋介石法西斯政治的最大地方实力派人物，深得蒋介石的看重与信任。

不过，张学良如此作为，全是出于希望中国很快统一、消弭内战、集中国力、恢复失地、早日实现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宿愿。这就是他和蒋介石的根本差异。

这时，他的旧部、东北军第九旅旅长李杜路过武汉。张学良得知即在武昌热情接见了他。李杜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长期在吉林转战抗日，后来孤军失援，弹绝粮尽，被迫退入苏联国境，后绕道欧洲返国求援。听了李杜的遭遇，张学良立即解囊相助，明确支持他潜返东北，再寻旧部，重举义旗，继续坚持东北敌后的抗日大业。

正是从这种光复东北的目的出发，张学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总”负责人后，也想在内战中一显身手，并亲自主持了三省的“剿总”军事会议进行内战部署。“剿总”参谋长钱大钧迅速督促参谋处绘制了《第五次围剿鄂豫皖匪区我军作战指导要图》，上列